

杜春娜 济南报道

五里山房

周晶退休前任齐鲁书社副总编辑,自己总结一生就干了“读书编书藏书”三件事。他出生于1942年,如今已到耄耋之年,他的“五里山房”在业界非常有名,然而我们此次采访并非在“五里山房”,而是在他位于舜德路的新居。

在周晶家中,一把竹椅,一本书,便足以成为他的读书之地。“我们家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周晶的爱人张书珍说。

在周晶家中的书橱中,古书被有序摆放起来,每部古书夹着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作者、书名以及版本。满榻的古书散发出时间长河里的悠悠纸香,令人不禁心生敬意。

他的藏书到底有多少?周晶也没有仔细算过,但粗略估计,万余册书早就已经有了。这些藏书大多放在原“五里山房”,在四间居室中,三间皆为书橱立架,包括厅厅、阳台,皆矗立着大大小小的20个书橱,集中放书的书房地板上也堆满了书,还有散放着的十数个装着线装书,旧期刊的纸箱。

“五里山房”的斋号因何而来?据周先生说,他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居住在济南南郊五里山路一小区中,此小区地处“马(鞍山)五(里山)六(里山)”风景区,因此便自称“五里山人”,书斋亦取名“五里山房”。著名历史学家、古文献学家黄永年先生曾给他题写斋号,搬家后他将黄先生题写的“五里山房”带到了新家,放置于书柜中,这也意味着,对于周晶而言,“五里山房”已然不再是一处固定的藏书之所,而是一种藏书的精神象征。

天生爱书

周晶是如何走上藏书之路的呢?他说最初只是为爱书,兴趣所至,古今中外皆可纳入藏书范围,后来藏书的范围逐渐变小,由于自修明清文学,他便开始系统收藏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文人的别集、选本,再到后来,特别注重访求山东籍文人的集子,以求保存乡邦文献。

“我是从‘小书’读到‘大书’。”孩童时喜欢看小画书,随着年龄渐长,慢慢变成读“大书”,种类从一开始的现代文学变为古代文学,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读的书多了,自然而然开始藏书了。

周晶是个“天生”的读书人,他小时候住在大连,五六岁的时候,他从邻家小伙伴那里看到了第一本书,那是一本纸已发黄,上图下文的方形本“小人书”。书名已经忘却,但周晶还记得那是一个吃狮子奶长大的孤儿,后来成为力大无比,所向无敌的英雄的故事。

大开本的连环画配有文字和图画,格外生动有趣,这些据《七侠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代小说和戏曲改编的连环画册成为了其读书、藏书的起点。

从在大连一家新华书店买到人生中第一本书——《大禹治水》连环画,到复学以后至初小毕业,周晶买的小人书已有几十册,整整齐齐装满了一只小木箱。后来,这些连环画大多是在迁家济南后,陆续与同学、邻居交换民间铅排本古本小说等成人读物或邮票了。

上初中后,看书多,买书也多。周晶曾把母亲给的买早点和买电车月票的钱都省下来买书,直到有一天“东窗事发”,母亲直接给他买了电车月票,才结束了其满头大汗跑着上学的生活。

时间转眼来到1958年春,因父亲工作调动,周晶举家迁徙到济南。“来到济南后,我真正的读书、买书生活开始了。”

济南淘书

曾经读过《老残游记》中的济南美景,听过评书里的“济南好汉秦琼”,16岁的周晶初到济南,对这里的一切既新鲜又熟悉。

“如果当时没到济南,可能不会发展成现在的样子。”诚然,济南的旧书店、旧书摊星罗棋布,让当时只见过新书或民国石印本或日本、苏联印的洋装书的周晶,顿时大开眼界。

彼时的周晶也正正值求知欲旺盛的年纪,这些铺天盖地的旧书、旧期刊,宛如一个百宝箱在他面

周晶在藏书界赫赫有名,他一生藏书上万册,被有当代“国内第一藏书家”之称的韦力先生称为山东著名藏书家,且评价其藏品“兼具学者之藏书及藏书家之藏书两种特点”,但与一般藏书家不同,他从来不参加各种拍卖会,失去了很多“致富”的机会。他爱书如命,却又舍不得将自己的藏书精品捐献给山东省图书馆。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在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我们走近这位一生与书打交道的老先生,想解开心中的谜团。



周晶在接受记者采访 杜春娜 摄

前打开,吸引着他去阅读。

刚来济南的那一年,也就是1958年,在济南纬十二路的西市场旧书店,周晶买到了人生当中第一部线装书——《笑林广记》。

“这家旧书店的店主姓陈,头很大,书店很小。”周晶仍记忆犹新,旧书店的面积顶多二十平方米,书摆得满满当当,一进店内满眼望去都是书。好书在店内,外边的门板上放着许多不值钱的“破烂”书,旧书、线装书掺着放在一些。

但周晶在这堆“破烂”中看到了一部清乾隆年间刻印的《笑林广记》,仔细翻看,觉得不错,花了五角钱购入。后来,周晶又重新整理了这版和光绪版的《笑林广记》,在齐鲁书社出版。

关于济南的藏书回忆,周晶也是历历在目。来到济南的某一年春节,周晶的母亲给了十元钱让其买一套新绒衣,他却用这笔钱买了一套清朝嘉庆年间翻刻青柯亭本的《聊斋志异》,线装十六册,要价六元。

这套书的价格当时是周晶父亲一个月的香烟钱,父亲被儿子“一掷千金”买书的“豪气”惹恼,一气之下愤而离家。“现在看,我也很愧对父亲。”但这次的苦涩经历并没有让周晶停下看书、藏书的步伐,对《聊斋志异》的兴趣也有增无减。

或许是因为地处齐鲁大地,加之在济南生活了六十多年,对山东文化产生了认同感,也或许是骨子里仍流淌着山东人的豪爽与细腻,周晶收藏山东文献越发得心应手。

周晶开始集中收藏山东人著作的线装古书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段时间也是其淘山左文献的黄金时期。“这时候工作了,手头相对宽裕些。”

济南的英雄山文化市场、古旧书店,皆是周晶的淘书乐园。有一次在英雄山文化市场,周晶见一人拿着一册《芥子园画谱》二集彩色套印本在叫卖,由于书品颇佳,不敢相信是日本,在犹豫之际,便被别人捷足先登。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在周晶懊悔之后,他蹲下身来,在一大堆残本零册中捡得一本明代历城名士周继撰的《阳宅真诀》上册,书后有“万历”刻书牌记,仅八元就买到。

“我收藏的山东文献多是‘小家’,因为名家的书籍存世多,已经被图书馆或藏书家收集。”与之相反的是,“小家”的书籍收藏则不尽如人意。考

虑到保存乡邦文献的重要性,周晶注重收藏山东的非名家书籍。久而久之,许多独一份的山东作家书籍都在他书斋里珍藏。

与一般藏书家不同,周晶从不参加各种拍卖会。老朋友韦力多次劝他改变观念,说“以藏养藏”对于藏书家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他虽感谢朋友好意却没能听从劝告。这其中是何原因?他说:“也许我也因此发点小财,但我志不在此。”他心里常想的,是要为他的藏书找个好的归宿。

“有藏有散”

2015年6月,山东省图书馆举办了一场特展,展品皆为山东地方文献,不仅有清代张尔岐、王士禛、周永年、蒲松龄、牛运震、翟云升、桂馥等名家的著作与题跋,亦有原不见记载的山东人如清韩邻佐、朱曾传、乐山等人著作。

事实上,这次的展览是“五里山房捐让山左文献特展”,展出的正是周晶捐让给山东省图书馆的山左文献。

周晶为何要把自己一生省吃俭用才得到的那么多珍品捐献出去呢?

“有藏就有散。”周晶坦然接受藏书的最终走向。

最早捐让图书的起因是,多年前的一天,当时的山东省图书馆善本室主任李勇慧到齐鲁书社找周晶。当时周晶正在开会,当着几位书社领导的面,她直截了当地说:“周先生,你不能将你收藏的古书给其他图书馆,要留在山东啊!”

周晶事后想来,李勇慧可能误会了,当时他与天津市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来往比较密切,李勇慧大概是听了一些风言风语。但经过这一番提醒,收藏的山东文献去留问题便经常萦绕于他的心头。退休之后,周晶有时间将自藏线装书进行整理,并编了简目,自此开始认真思考这些古书的去留。

“我本身就对山东省图书馆的感情很深,在从事编辑工作时,他们对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并且,山东省成立了省古籍保护中心,由山东省图书馆负责,聘请周晶为其中的专家,他也参加了几次省内珍本古籍的评选活动,深深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

再三斟酌下,2014年末,周晶做了一个重要举动,他将自己收藏的98种山左文献中的精品,旧木刻雕版(章丘郭氏族谱序)1块,民国初商务印书馆书匡(匡面有山东反袁青年志士诀别亲人刻字)1只,以及清代山东著名画家高凤翰《菊石图》1轴,共101件,一举捐让于山东省图书馆。

这批山左文献中的线装古籍内容丰富,其中既有稿本、抄本、刻本、拓本、石印本、铅印本,还有极为珍贵的名家题跋本、批校本,更有孤本31种,稀见本约40种,《山东文献书目》《山东文献集成》《中国古籍总目》等书目不曾著录,2种《山东文献集成》予以影印,3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全国仅1家图书馆收藏。“一下把收藏多年的文献捐出去,说不心疼是假的。”多年以后说起自己这些呕心沥血的收藏,他还是非常留恋。

“书卷多情似故人”,对于捐出去的“老朋友”,周晶非常惦念。2018年秋,有次他去省图书馆办事遇到了历史文献部主任杜云虹,便向她表示想看看他的“老朋友”们是否安然无恙。杜云虹当即把他带到了省图特藏之一的海源阁书库。当杜云虹打开其中一个书橱,他看到了那批久违的旧藏。周晶既感动又欣慰,他知道,自己的宝贝们到了它们应该到的地方。不但被保管得很好,而且“待遇”极高,因为海源阁可不是一般藏品能待的地方。“藏书家最后还是应当回报社会,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作为一个山东人,把山东文献留在山东,周晶觉得非常满意。

此后,他有机会就时不时地去省图看一下“老朋友”。如今已经82岁的周晶虽然有些驼背,但仍耳聪目明。他说,只要腿能动、眼能看,还会逛书店、书摊,享受淘书的快乐、读书的幸福和藏书的乐趣。

杜春娜 济南报道

走上古籍整理之路其实挺偶然

1981年,杜泽逊以枣庄市高考语文全市第一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当时的山东大学古典氛围浓厚,以文史见长的办学特色凸显。

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气氛中,来到大学的杜泽逊常常“泡”在图书馆里读书。无论古今中外,都被他纳入阅读的范围,但有一年,一部特定先生编纂的《联绵字典》吸引了他的注意,这是一部搜集六朝以前所有联绵字、解释双声叠韵词的词典。

姑且不论具体内容,一打开这本词典,杜泽逊就被一张图片所吸引。图片中,作者的手稿摆起来的高度比本人还高,编纂一本书就实现了“著作等身”,这无疑给年轻的杜泽逊留下了一些震撼。“我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学者。”这个念头从此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中。

但杜泽逊走上古籍整理的道路,其实有一定偶然性。

因为当时学习古汉语比较多,一开始,杜泽逊定下的目标是报考当年山东大学文学院古汉语名家殷焕先先生的研究生。不过,当年殷先生在全国只招两个研究生。“我一个同学跟殷先生平时学得不多,觉得竞争不过,这样还剩下一个名额,但认为压力太大,就产生了退学的念头。”

既然报考殷先生的研究生希望不大,那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此时,这成了杜泽逊思考的问题。

1981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1983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批准在一部分高校成立了古籍整理研究所,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于当年被批准成立。

1985年,古委会成立的高校古籍所招收了第一届古籍整理研究生班,国家教委直接批名额,山东大学古籍所招了10名研究生。1985年,杜泽逊毕业,正好碰上古籍所招研究生,于是,他决定报考试一试,最终顺利考上。

在研究生班中,杜泽逊学习了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古籍导读等课程,作为正儿八经的古籍整理人才培养,1987年,他毕业后留校,仍在古籍所工作,被指定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教。

在实践中长本事

作为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当时杜泽逊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王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第一次上手国家项目,彼时才二十几岁的杜泽逊尽管理论知识丰富,但具体的实践应用,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虽说不能假把式,掌握好真正的古籍整理研究,还需要走到实践中。为此,王先生给杜泽逊开书单,让其写提要。“王先生开的书单里有一百多部书,都是版本目录方面最重要的书。”杜泽逊称,“提要首先要厘清藏书家的生平事迹,藏书的特色,继而梳理编这部目录的原因,要解决什么问题,有什么价值,有哪些罕见的书以及藏书是否得到传承等。”

一部、两部……两年的时间百余部书全部读完,每部书的提要都交由王先生批改,由此杜泽逊也清楚了藏书家的历史。

实际上,得到的锻炼远远不止如此。“王先生与好多老先生有书信往来,信里他们都用文言文。”来的信件,王先生也会拿给杜泽逊看,甚至有时回信也要等他先看完。“这样,我在了解这些学术信息的同时,能够学会用文言文写信。”

王先生还曾给过杜泽逊两本书,并让其据此写一篇评论,说是书,其实是由书信集结而成。这些书信是影印而成的行书,且没有标点,比较难读。

读不懂怎么办?先生已经布置下任务,无论如何也要迎难而上。杜泽逊只好反复读,了解语言习惯,有关的知识。“只要读懂了,就可以认识那些不容易认的字,断开不容易断的句。”

经历了一个暑假,杜泽逊埋头苦读,把这两本书“啃”下来后,写了一篇评论。“评论在王先生修改后,也最终发表了。”经历

今年61岁的杜泽逊先生,是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古典文献学专家。自1987年第一次参与重大项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开始,从事古籍整理已经37年,成绩斐然,堪称国内业界翘楚。有人说,古籍整理好比地质队的野外勘探,是一个枯燥的工作,必须甘于寂寞,不慕繁华,才能深入进去。那么,杜先生是如何在这一看似十分枯燥的领域,一干就是大半生呢?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对杜先生进行了采访,听他聊他的读书生涯,以及一头扎进故纸堆的前因后果。



杜泽逊在接受记者采访。 杜春娜 摄

了王先生多次的“磨炼”后,在杜泽逊看来,他也了解了民国年间著名学者、政治家等人物写信的称呼、格式、抬头、落款等内容。

第一部像样的成果

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存目标注,再到《清人著述总目》×清史·典籍志》……在从事的十个古籍整理项目中,杜泽逊认为第一部像样的成果是《四库存目标注》。

《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六个来源:内府本、赞撰本、各省采进本、私人进献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合格的著作可以被抄入《四库全书》,但不合格的著作,不能被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

《四库全书总目》记载的书有一万多种,其中三分之一是《四库全书》收入的,三分之二是“存目”,也就是《四库全书》未收而仅仅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保存了目录。其实,部分“存目”书早在清代就受到关注,乾隆时期就有单行的木刻本,但毕竟“存目”之书是四库馆臣认定的“次等货”,受重视程度不够高。

1992年1月11日,腊月初七,位于琉璃厂海王邨大院内的中国书店还没有正式歇业,一本民国间学者批注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正懒洋洋地躺在书架上,殊不知,它的命运马上就要迎来改变。彼时,杜泽逊正跟着王绍曾先生编《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因为《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是中华书局约稿,他多次到王府井中华书局送稿子。1992年1月,事情办完后,杜泽逊便抽空到琉璃厂“寻摸老书”。这一次,他正巧发现了这部《四库全书附存目录》。

这部书为线装本四册,当时价钱八十多块。因是第一次见到单行本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杜泽逊把这本书捧在手里的时时候,心里便隐约感知到了这部书的价值。重金买下后,他便开始从事四库存目标注工作。

回到济南后,杜泽逊买了十几个硬皮本子,和爱人分工,把“存目”中的6793种书的书名、卷数、著者及朝代抄在十一个本子上。各书之间留下四行空白处,准备填写见知版本。但同时,他主要的空闲仍用于《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感受到《四库全书附存目录》重要性的不止杜

泽逊一人。1992年6月份左右,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在香山饭店召开,会后北大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提出编纂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计划,获得国务院古籍小组组长匡亚明先生批准,季羨林先生任总编。

在那个时候,海内外对《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的6793种书作专门调查研究的只有杜泽逊一人,故而1993年他受邀参加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工作。而这一干,就在北京待了四年,一直到1997年10月底完工。“当时还兼顾着王先生的一个项目,他还让我早回来咧。”

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完工后,杜泽逊开始写定《四库存目标注》。到2005年,《四库存目标注》写定工作完成,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从1992年算起,前后15年,至此,代表作《四库存目标注》最终完成。

“有些事情总得有人干”

投身于古典文献学几十年,杜泽逊曾先后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省级重大古籍整理编纂项目。细数发现,这些项目,几乎每一项都“日持久,短则几年,长则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2004年开始的《清人著述总目》项目,2012年开始的《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2017年正式开始的《日本藏中国古籍总目》,2021年12月正式立项的《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2022年底正式启动的《齐鲁文库·古籍编》……目前,杜泽逊手头的大项目齐头并进。

时间是最好的工具,在数十年如一日的作品中,项目成果开始逐渐出现。

一套木刻版的《十三经注疏》有一万多个版面,重要的版本有15个,每个版本要校对三遍。“按页数算,《周易注疏》在整个《十三经注疏》中占3%,这3%的内容就要15个人校对一年。后来又花了两年的时间校对完了《尚书注疏》,它的页数占比是6%。”换言之,三年中,15个人校对79%。

按照当时的工作量来算,要完成《十三经注疏》汇校点校工程,一个人就要校对许多年。无奈下,只能扩大团队人数,由15人变成了36人。

团队人员变多,开支相应增多,这些年来,经费早就已经花光。这里凑凑,那里挤挤,维持到现在。不过万幸的是,《周易》×《尚书》×《毛诗》已经完成校对工作。

《十三经注疏》烦琐的工作也是古籍整理研究的一个缩影。《清人著述总目》项目更是20年才出了清样。

“《清人著述总目》项目开始时,网上资料还不那么丰富,所以采用了传统办法——抄卡片。”参加抄卡片的师生共300多人,共抄制卡片130万张。经过合并重复,计得清人著述22.7万字。2012年完成后,又陆续修订,2023年暑假才由中华书局出来清样,16开40册,共25000页。

“从41岁开干,到61岁出清样,什么样的考核才耐得住呢?”虽说做的是国家重大项目,但考核只承认正式出版物和期刊论文等内容。二十年才出清样,这就意味着二十年间这个项目的考核都是零分。而杜泽逊参加的重大项目短期几年,长则几十年后才能出成果,势必在考核上要吃亏。

不仅如此,这些年来,因为一直在做集体项目,杜泽逊毕业时想做的项目基本都没有机会,“只有《四库存目标注》算是自己做的”。

1988年,杜泽逊撰写的硕士毕业论文与《四库全书总目》有关,为了写好这篇论文,他在1987年至1988年间用10个月读完了《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提要》)200卷,并据此做了10类卡片,即十个专题。可惜的是,论文只写了其中一个专题“辨伪”,即《四库提要辨伪学发微》。另外九个专题的卡片一直摞着,36年至今没有打开。

那么,他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因为这些工作总要有有人干,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医生救人的命,古籍整理则救“书”的命。“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凝聚着中华先人的智慧和哲理,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承载者和见证者,让湮灭的典籍重新浮现在人世间,是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的使命。”

今年1月,杜泽逊又担任了《文史哲》编辑部主编兼主任。但他说,无论干什么,肯定还会继续从事古籍整理工作,这辈子是不准备从故纸堆里爬出来了。

杜泽逊：故纸堆里写就精彩人生

延续古书命脉,37年来主持多项古籍整理重大项目

一辈子与书打交道,他把上百册精品藏书捐赠给省图书馆

周晶：就该让书去该去的地方